

民主——一部关于美国的小说

〔美国〕亨利·布·亚当斯著



Henry Brooks Adams
Democracy
An American Novel

据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, Inc.

1968年版本译出

封面设计：徐步功

民主——一部关于美国的小说

MIN ZHU

—YIBU GUANYU MEIGUO DE XIAOSHUO

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 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刷

字数139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7 $\frac{1}{4}$ 插页2

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15,600

ISBN 7-5016-0011-2/I·12

书号 10208·286 定价 1.45 元

莱特富特·李太太决定到华盛顿去过冬，而其原因则被许多人认为荒唐乖悖。她身体壮实，却偏说那里的气候有益于健康；她在纽约宾朋如云，却突然想念寥寥几个波托马克河畔^①的熟人。仅仅在最亲密的知交面前，她才直言不讳，坦率地承认自己备受精神空虚、百无聊赖之苦。自从五年前丈夫去世之后，对于纽约的社交界，她已经胃口倒尽，趣味索然了。她对股票的价格漠不关心，对从事股票交易的人们毫无兴趣；她变得严肃了。这群乱七八糟的男男女女，单调乏味得与他们居住的褐色砖房一样，哪里值得一顾呢？她在心灰意懒中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。她阅读了一些德文的哲学原著，却越读越沮丧，因为如此精深的文化居然使人一无所获———无所获！在与一位博览群书、持先验论观点的代理商谈论了一晚的赫伯特·斯宾塞^②之后，她也看不出把时间花在哲学上，是否会比早年同一位年轻风流的股票经纪人调情卖俏更加上算。其实，否定的证据是十分明显的。调情卖俏尚可以有所结果——事实上也真的导致一桩婚姻；而哲学，除了有可能导致另一个同样乏味的晚上，实在

① 波托马克河：源于西弗吉尼亚州，流经华盛顿的一条河道。

② 赫伯特·斯宾塞(1820—1903)：英国哲学家。

毫无意义。因为那些先验论的哲学家们大多上了年纪，一般都有家室，白天忙于事务，一到晚上难免有点昏昏欲睡。然而，李太太尽量学以致用。她投身慈善事业，探访监狱，巡视医院，阅读贫民文学和犯罪作品，和那些作恶作孽的统计数纠缠在一起，以致心目中几乎看不到道德的影子。最后，她对这事感到十分厌恶，终于不能忍受了。看来，此路似乎也行不通。她断言自己已经失去责任感了，就她而论，纽约所有的贫民和罪犯，尽可以从今以后威风凛凛地起来造反，控制这块陆地上的每条铁路。她何必操这份心呢？这个城市关她什么事？在这个城市中，她找不到什么似乎需要拯救的东西。人多就有什么特别神圣的地方吗？一百万彼此相似的人，为什么就比一个人更有趣呢？对于这个拥有百万之众的巨大怪物，她能把什么思想灌注到它的心中，使之无愧于她的挚爱和敬重呢？宗教吗？成千上万的教会正在不遗余力地见缝插针，根本没有她创立新教、充当受神启示的先知的余地。雄心壮志？崇高的受人景仰的理想？追求任何高尚纯洁的目标的热情？她一听到这些词语就有气。难道她自己不正是被雄心壮志吞没的吗？而现在，不正是因为找不到为之牺牲的目标而满心惆怅吗？

莱特富特·李太太如此痛恨纽约、费城、巴尔的摩和波士顿，痛恨一般意义上的美国生活和特殊意义上的一切生活，其原因究竟是雄心壮志——真正的雄心壮志——抑或仅仅是烦躁不安呢？她想要什么呢？不是社会地位，因为论出身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体面的费城人。她父亲是著名的

牧师，丈夫也同样无可指摘，是弗吉尼亚李氏宗族的一个支脉的后裔，这个支脉为了寻求财富而移居纽约，后来如愿以偿，或者说，找到了足以使这位年轻人在纽约安身立命的财产。在社会上，他的遗孀拥有她自己的无人争议的一席之地。她虽然不比左邻右舍颖悟多少，但人们一直认为她属于聪明的女人之列；她富有财产，至少拥有相当可观的数量，足以提供一个明智的女人享受美国城市生活的全部金钱；她有住宅和马车，衣着体面，饮食精美，使用的家具决不落后于装璜艺术的最新水平。她游历过欧洲，在历时数年的几次访问之后，回国时一手抱着一帧青灰色的风景画——令人心旷神怡的葛鲁^①的典型作品，另一手提着几包波斯和叙利亚的地毯、刺绣，以及日本的瓷器和青铜艺术品。于是，她就宣告已经阅尽欧洲了，并且坦率地公开承认自己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人。她既不明白，也不怎么在乎究竟居住在美国好，还是居住在欧洲好；她对两者都没有强烈的挚爱；对辱骂两者也不抱反对态度。但是，她一定要猎取美国生活势必提供的一切，酸甜苦辣，兼收并蓄，点滴不遗；她决心非竭尽美国生活之所有不可，凡是能够从中获得的，她都要大量索取。“我知道，”她说，“美国出产石油和肉猪，我在轮船上见到过它们；我还听说它出产白银和黄金。任何女人都可以挑挑拣拣，择其所好。”

不过，前面说过，李太太最初的生活遭遇并不顺遂。她

① 葛鲁(1796—1875)：法国画家。

不久便公开宣称，纽约尽管可以作为石油和肉猪的象征，但生活的黄金，却是殊非她的眼睛能够从中发现的。虽然生活是各种各样的；各种各样的人、职业、目的和思想；但是所有这些在到达一定的高度后就都突然停止了。它们找不到支撑它们的东西。她或亲或疏地认识十几个富翁，他们分别拥有从一百万到四千万不等的财产。可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钱财的呢？能够拿这些财产派什么与众不同的用途呢？要知道，花费的金钱多于足以满足一切个人需求的数量是愚蠢的，在同一条街上居住两幢房屋、赶着六匹马拉车行都是鄙俗的。然而，在留出一定的进款以满足一切个人需求之后，余下的部分怎么办呢？让它们存积起来无异于承认自己的失败。李太太极其痛苦的是，这些剩余收入确实在日积月累，但既不能变更、也不能改善它们主人的品质。把它们化在慈善事业和公共设施上无疑是值得嘉许的，但谈得上明智吗？李太太读过许多政治经济学和有关贫民的报道，倾向于认为公共设施应该是公众的义务，个人的巨额捐赠虽然有益，但也有害。退一步说吧，即使把它们用于慈善目的，除了增长那种令她痛苦不堪的人性，使之永继不衰而外，还有什么作用呢？一碰上这个问题，那些纽约的朋友无不求救于根深蒂固的陈腐之见，对此，她毫不顾忌地嗤之以鼻，说她尽管非常钦佩著名旅行家格列佛先生的天赋，但自从寡居以来，却始终不能接受他那大人国^① 的信条：一个政

① 指英国作家江奈生·斯威夫特所著《格列佛游记》中的大人国。

治家，如果能让原来只长一片青草叶子的地方长上两片，那就应该比所有的同行都更多地受到人类的敬重。倘若这位哲学家当时提出青草的质量应该经过改良，那她就不会对他吹毛求疵了；“不过，”她说，“坦率地说，要是在现在只有一个纽约人的地方见到两个纽约人，我实在不能强装高兴；这一见解太荒唐了；一个半就够要我的命了。”

又如波士顿的朋友们。他们说她所需要的正是从事更高级的教育，她应该投入为大学和艺术学校而奋斗的神圣行列。李太太朝他们莞尔一笑。“你们知道吗？”她说，“我们纽约已经办了一所全国最阔气的大学了，迄今为止，唯一的困难一直是即使花钱也雇不到学生。你们要我到街上去拦截孩子吗？如果那些异教徒不肯改邪归正，你们能够授权我用火刑柱和武力逼迫他们上学吗？纵使你们能够这样做，纵使我把五马路的小伙子统统赶进大学，迫使他们统统认真地学习希腊语，拉丁语，英国文学，伦理学以及德国哲学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们在波士顿是这样做的，现在坦白地告诉我，结果如何？大概你们那里有一个光华夺目的上流社会；大概培根街到处都是诗人，学者，哲学家，政治家；你们的晚会一定妙趣横生，你们的报纸一定才智横溢。可我们纽约人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？我们不常进入你们的社交界，但一当我们进入时，却发现你们的社交界并不见得比我们的优越多少。你们同其他人一样，都长到六时高就停止了，为什么没有人长成冠盖如云的大树啊？”

纽约社交界的一个平常之辈，虽然经常领受头领们的

这种轻蔑态度，却以平庸之见盲目地反唇相讥。“这女人要干什么？”他说，“被图伊勒伊花园和马博罗宫^①搞昏头了吗？以为自己该当女皇还是怎么的？为什么不去宣讲女权运动，不去登台演戏啊？如果她不能象别人一样安守本分，何必仅仅因为自己不比我们高大就血口喷人呢？她想从尖酸刻薄的唇枪舌剑中得到什么啊？说到底，她懂得什么！”

李太太的确懂得很少。她贪婪地、不加选择地阅读各种书籍，一个科目接着一个科目地生吞活剥，以至拉斯金、泰恩与达尔文和斯图尔特·米尔，格斯泰夫·德劳兹与阿尔杰农·斯温伯恩^②联袂携手，从她的脑海中蹁跹而过。她甚至不怕困难，在本国文学上花过功夫，也许还是全纽约唯一了解一点本国历史的女性。当然，她未必能够按先后顺序背出历届总统的姓名，但毕竟知道美国宪法把政权分为行政、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，知道总统、议长和大法官都是重要人物，因而下意识地感到纳闷：他们能不能解决她的问题？他们是不是她想象中见到的浓荫大树？

既然如此，烦躁不安也罢，不守本分也罢，雄心勃勃也罢——随便你怎么叫吧——就可以解释了。这就是远洋轮船上，那种必须先到机舱去同技师谈谈，而后才能放心的乘

① 图伊勒伊花园：原法国皇室的御花园，焚于一八七一年；马博罗宫：英国十七世纪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将领马博罗的官邸。

② 拉斯金（1819—1900）：英国散文家、批评家和社会改革者；泰恩（1828—1893）：法国历史学家和批评家；斯图尔特·米尔（1806—1873）：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；德劳兹（1832—1895）：法国小说家；阿尔杰农·斯温伯恩（1837—1909）：英国诗人和评论家。

客的心情。她想亲眼看看那些原始动力的作用，亲手摸摸那架巨大的社会机器，亲自衡量一番那动力的能量；她打定主意，一定要深入庞大的美国民主和政权系统的心脏，去探究它们的奥秘。她并不在乎这种刻意追求会把自己引向何方，因为，以她自己的话说，她至少已经耗尽两条生命，在此过程中，简直已经坚强得麻木不仁了，因而决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生命。“一个女人，”她说，“失去了丈夫和一个婴儿而能保持自己的勇气和理智，那就必然变得非常坚强或者非常软弱。现在，我是纯钢一块，你可以用杵锤冲击我的心脏，它一定会把杵锤弹回去。”

也许，在探尽政治界的奥秘之后，她还会去闯别的领域，但她没有妄称此后要到哪里去，或者要干什么，只表示现在想领教一番政治中可能存在的乐趣。她的朋友们说，华盛顿那群代表各地选民的平庸无知的男人无聊之极，相比之下纽约简直是新的耶路撒冷，百老汇大街简直是一所高等学府。他们问她指望从那群人中能找到哪种乐趣。她回答说，如果华盛顿社交界枯燥到如此地步，那她就如愿以偿，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回来了——高高兴兴，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心情啊。但是她内心深处憎厌这种寻找男人的提法。她认为自己希望见识的，乃是集中在华盛顿周围的四千万人民和整个大陆的利益冲突；乃是这种被血肉之躯的男人们引导着、约束着、控制着，或者失去约束、不可控制的利益冲突；乃是政权的巨大力量和运转中的社会机器。她探求的乃是权力。

也许，在她的头脑中，社会机器的力量与其技师的力量，即操纵社会机器的人们的权力，有些混淆不清。也许，真正吸引她的，乃是人类对于权力的兴趣；无论她的否认多么强烈，为行使权力而行使权力的热情，毕竟可以迷惑和欺骗一个穷竭一切女性的寻常娱乐的女人。不过，何必去推测她的动机呢？舞台就在她的面前，幕布正在揭开，演员即将登场，她只要悄悄地溜进配角中间，就能见到戏剧怎么上演，戏剧效果怎么产生，悲剧演员怎么装腔作势以及舞台监督怎么诅咒诟骂了。

—

十二月的第一天，李太太乘火车前往华盛顿，当晚五点前进入新近租赁的座落于拉菲莱特广场的寓所。她又鄙夷又懊恼地对怪诞粗俗的窗帘和糊墙纸耸耸肩膀，于是，接着的两天就进行了一场全力征服环境的殊死搏斗。在这场激烈的较量中，注定失败的房屋内如同闯进一个魔鬼，所有的椅子、镜子和地毯，无不在劫难逃。新来的女主人端坐在最混乱的地方，象前面广场上的安德鲁·杰克逊^①雕像一样沉着，以这位英雄人物一生中最果断的精神发号施令。第二天傍晚，她大获全胜。一个新的纪元，一种对于生活和义

① 安德鲁·杰克逊（1767—1845）：美国将军，于一八二九——一八三七年任美国第七任总统。

务比较崇高的观念，在蒙昧的未开化的住所中初露端倪了。叙利亚和波斯的财富纷抢占向忧郁灰暗的威尔顿地毯；日本和德黑兰灿若彗星的刺绣和金丝织品悬垂而下，遮盖了每一条色泽黯淡的毛质窗帘；墙上，素描、油画、风扇、刺绣、瓷器等等，或悬或钉，或粘或贴，纷然杂陈，别具一格；最后是那件家庭祭坛上的饰品，神秘莫测的葛鲁风景画，高踞于客厅的壁炉之上。于是鏖战消歇，大功告成；落日的余晖，温柔地流进窗口，在被救赎的房屋和女主人的心中一齐恢复了平静。

“我看这样行了，西比尔。”女主人环视着周围的场面说。

“还能不行？”西比尔回答说，“你连一只盘子、一把扇子、一条彩巾都不剩了。如果还要盖点什么，就非得派人去买几块黑人老太婆的花头巾不可了。这样布置起来有什么用处呢？你以为华盛顿有什么人欣赏吗？他们还以为你在发疯呢。”

“总得有点自尊心吧。”姐姐平静地回答。

西比尔——西比尔·罗斯小姐——是马德琳·李的妹妹。对她们两人，即使最精明的心理学家，也找不出半点相貌上或者性格上的相似之处；也正因为如此，她们才彼此怜爱，情同手足。马德琳三十岁，西比尔二十四；马德琳不可捉摸，西比尔开朗坦率。马德琳中等身材，丰纤合度，头部匀称，金黄的秀发衬托着表情丰富生动的脸蛋。她双眸的色泽，从来不曾连续两小时保持不变，只是蓝的时候居多，灰

的时候较少；妒忌她微笑的人说她养成一种幽默感，以便显示自己的牙齿。他们的说法也许不错，不过，除非知道自己的双手不但极其优美，而且富有表现力，她就不会养成借助手势说话的习惯，这一点则是确确实实的。在衣着方面，她与纽约妇女一样高明，但随着年岁的增长，逐渐显露出一些不从习俗的危险迹象。人们听到她批评过纽约妇女盲目崇拜沃恩先生的金色领带；当这种崇拜方兴未艾时，她甚至与一个衣着华丽的朋友发生极其激烈的争论。那位朋友应邀参加过沃恩先生的午后茶会。李太太之所以如此，其中的奥妙在于她有艺术家的脾性。这种脾性，如果不及时加以抑制，后果必然不堪设想。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造成危害，实际上反而赋予她那种某些女人才有的风采。它象晚霞那样难以形容，象印度夏天的雾气那么不可触摸，只有凭感觉而不是凭理性的人才能察觉。西比尔根本没有这种韵味。她的想象力从不花在回首往事上。世界上几乎没有什
么比她更加热情坦率、表里如一、思想单纯、无忧无虑、富有同情心和不折不扣地讲究实际的少女。她心中既容不下往事的残迹，也容不下对未来的憧憬；纵使在教堂中度过白天，在坟墓中度过夜晚，也绝不能生活在过去或者未来之中。“谢天谢地，她并不聪明，不象马德琳。”马德琳不是教会中的正统派教友，她讨厌布道，没有一个牧师不激怒她整个容易兴奋的神经系统；而在讲究仪式的圣坛前，西比尔却是天真而虔诚的礼拜者，谦卑地顺从使保罗传道会的神父。参加舞会时，她虽然绝无例外地得到客厅中的最佳舞伴，而

且以为理所当然，却又总是向上帝祈求最佳舞伴。不知怎的，这坚定了她的信仰。姐姐很注意，决不因此嘲笑她，也决不惊动她的宗教观念。“有的是时间，”姐姐说，“到宗教让她失望时，她会忘掉它的。”至于经常上教堂的问题，马德琳轻而易举地调和了她们之间的不同习惯。马德琳已经多年不上教堂了，推说这使她产生了不配当基督教徒的感情；西比尔的音质很好，歌喉训练有素，马德琳便坚持要她参加唱诗班。通过这点小小的计谋，她们思想轨道上的差异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。马德琳不会唱歌，所以不能与西比尔一道上教堂，这个弥天大谎似乎卓有成效，西比尔深信不疑地完全接受了，犹如相信合理的规章制度本身就是充足的理由一样。

马德琳不放纵嗜欲，不浪费金钱，不炫耀自己；她宁愿步行而不常乘车，既不戴钻石，也不穿锦缎，但给人们的一般印象却还是生活奢侈。相反，妹妹却购置巴黎服饰，按照巴黎的全部定规穿戴打扮，温存地俯下洁白丰腴的双肩，听凭巴黎的时装专横地压上一切负担。对此，马德琳照单付帐，从不干预。

到华盛顿还不到十天，她们就仪态万方地进入自己的舱位，毫不费力地在社交生活的河流中游荡了。上流社会是友好的。没有不友好的理由。李太太姐妹俩没有仇敌，没有公职，而且竭力让自己受人欢迎。西比尔在纽约过冬，在新港度夏，并非徒然无益；而她的容颜和身姿，声音和舞步，更是无可非议。当然，政治不是她的长处，有一次在

别人的劝诱下，她到国会大厦去了一次，在参议院的旁听席上坐了十分钟。谁也不知道她的观感如何，她以女性的机智避免暴露自己的观点。其实，她对立法机构的概念是很模糊的，游移于教堂与歌剧院中的两种感受之间，所以，宛如某种表演的想法始终没有离开她的脑海。在她的心目中，参议院是人们背诵讲演稿的地方，她天真地以为那些讲演全都有其作用和目的，但由于不感兴趣，便从此裹足不前了。对于国会，人们普遍持有这种观点，许多国会议员也不例外。

姐姐比较有耐性，比较勇敢，至少在连续两星期中，几乎天天都去国会大厦。第二个星期末，当兴趣开始减退时，她觉得与其去国会旁听，还不如阅读《国会议事录》上的辩论记录。她发现那是一桩既费力而又非始终有益的差使，便跳过那些枯燥乏味的部分，最后，如果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议题，便全部一晃而过。不过，当偶而被告知某个著名演说家，就什么全国关注的问题发表演说的时候，却仍然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议院的旁听席。她只要能够去听，就一定怀着几分钦佩的心情听下去，只要是值得钦佩的，就一定感到由衷的钦佩。她一语不发，如饥似渴地凝神谛听，希望了解政权机器是怎么工作的，了解操纵政权机器的人们具备怎样的品质。她把他们一个个地放进自己的坩埚，以强酸烈焰去检验他们。少数人经受住检验，虽然多少有些变形，但终究活着出来了；那些变形的地方就是品质不纯的表现。在所有那群人中，通过这一检验，只有一个人保持相当的属性

而足以引起她的兴趣。

这些刚刚开始的对国会的访问，有时，李太太是在约翰·卡林顿的陪同下进行的。他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华盛顿律师，由于是弗吉尼亚人和她丈夫的远亲，所以自称表兄，说话的口气近乎亲昵。这一点是得到李太太的认可的，因为他不但是她喜欢的那种男子汉，而且他受过生活的虐待。他属于南方的不幸一代，与内战一道走向生活；他的不幸，也许还不止于此，因为象大多数在从前的华盛顿学校受过教育的弗吉尼亚人一样，他一开始就看出无论战争的结局如何，弗吉尼亚必然遭到灭顶之灾。他二十二岁时参加叛军，最初是当兵，扛着毛瑟枪随波逐流地经过一、两次战役，慢慢地在自己的团中升到上尉，最后在一位少将的参谋部服务。凡是自以为职责之内的事情，他工作起来总是极其审慎，但是从来都毫无热情。叛军投降后，他骑马回到自己家的庄园——这并不困难，他家距离阿波马托克斯^①只有数哩之遥——立即开始钻研法律，继而让母亲和妹妹尽其所能地照料荒芜的庄园，自己到华盛顿从事律师业务，希望赖以谋生糊口，养活她们。差强人意的成功，使他的前景第一次不那么一团漆黑了。李太太的房屋成了他沙漠中的绿洲，他惊奇地发现，在她的面前，自己几乎称得上快活。那是一种非常恬静的快活，以至西比尔尽管对他很友好，也难免认为他一定相当乏味；然而，这种乏味却吸引着马德琳。

① 阿波马托克斯：位于弗吉尼亚州中部，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，南军在此投降，南北战争于是结束。

她尝过的生 活之酒，酸甜苦辣，远远超过西比尔，学会了赏识某些不为幼稚无知的人们所领略的风昧和陈年的醇美。卡林顿先生说话慢条斯理，几乎有点困难，带点那种从前弗吉尼亚学校培养出来的、被人称为呆板的尊严，而连续二十年的重负和迟到的希望，更给他增添了一抹近乎忧愁的谨慎。他巨大的魅力在于绝口不谈、甚至从不想到自己。李太太本能地对他深信不疑。“他是一个典型！”她说，“我看三十岁时的乔治·华盛顿就是那个样子。”

十二月的一天，临近中午时，卡林顿跨进李太太的客厅，问她愿不愿意到国会去。

“今天你将有幸听到的演说，也许是我们最伟大的政治家的最后一场了。”他说，“你得去听听才好。”

“我们国产原料的最佳样品吗，先生？”她问道。她刚刚放下狄更斯的小说，书中描绘的美国政治家的精彩形象，犹自跃然在目。

“一点不错，”他说，“波奥尼亞的草原巨人，伊利諾斯州的政治宠儿，去年春天以三票之差没有被他的政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，而且失败的原因，仅仅是十个小阴谋家比一个大阴谋家更加厉害。这位赛拉斯·P·拉特克利夫阁下，伊利諾斯州的参议员，他以后还会参加总统竞选呢。”

“他中间那个‘P’是什么意思？”西比尔问。

“就记忆所及，我从未听人谈起过他的中名，”卡林顿说，“可能就表示波奥尼亞或者大草原^①吧，我也说不上。”

① 波奥尼亞(Poenia)和大草原(Prairie)都以字母P开头。

“就是上星期我们在参议院时叫我大吃一惊的那位吧？那个庞然大物？六呎多高，一副威风凛凛的参议员架势，顶着个大脑袋，很有点相貌堂堂的？”李太太问道。

“正是，”卡林顿回答说，“无论如何，去听听他的讲演吧。他是新总统的绊脚石，不把他稳住，新总统就不得安宁，所以大家都认为，这位波奥尼亞的草原巨人一定可以选择国务院或者财政部。如果真的在它们之间挑选，那他必然选中财政部，他是不顾一切的政治掮客，希望在下次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得到支持。”

李太太很高兴去听了这场辩论，卡林顿也很高兴坐在她的身旁，随时同她交换关于讲演和讲演者的实况评论。

“你和这位参议员打过交道吗？”

“在他的委员会当过几次顾问律师。他是一个出色的主席，总是考虑周到，通常也很有礼貌。”

“他籍贯哪里？”

“出生在一个新英格兰家庭，一定是很体面的。他大概是康涅狄格流域的人，但不知是弗蒙特人、新罕布什尔人还是马萨诸塞人。”

“受过教育吗？”

“在当地的一所大学受过传统的教育。我看他受的教育不多不少，对他恰到好处。他一离校就倏地跑到西部去了，那时他年纪轻轻，刚从废奴制的温床中出来，所以一头栽进伊利诺斯州的废奴运动，经过长期斗争，随着运动的高涨步步青云。可他现在恐怕不会那么做了。”